

DARK MOMENT

黑暗时刻

希特勒

大屠杀与纳粹文化

下

单世联 - 著

SPV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DARK MOMENT 下

黑暗时刻

希特勒

单世联 - 著

大屠杀与纳粹文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单世联著.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9

ISBN 978 - 7 - 218 - 10298 - 6

I. ①黑… II. ①单… III. ①希特勒, A. (1889 ~ 1945) - 人物研究②德意志第三帝国 - 史料 IV. ①K835.167 = 5②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7949 号

Hei'an shike xitele datusha yu nacui wenhua

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 单世联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责任编辑：古海阳

装帧设计：后声文化

排版：科新电脑技术服务中心

责任技编：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 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72.5 字数：1112 千

版次：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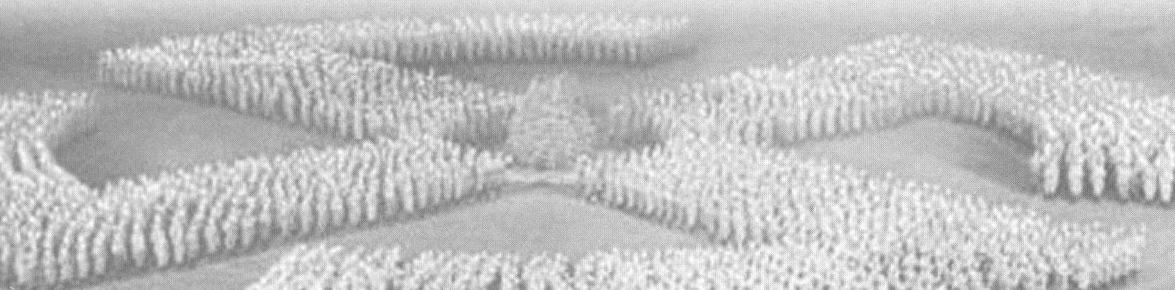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5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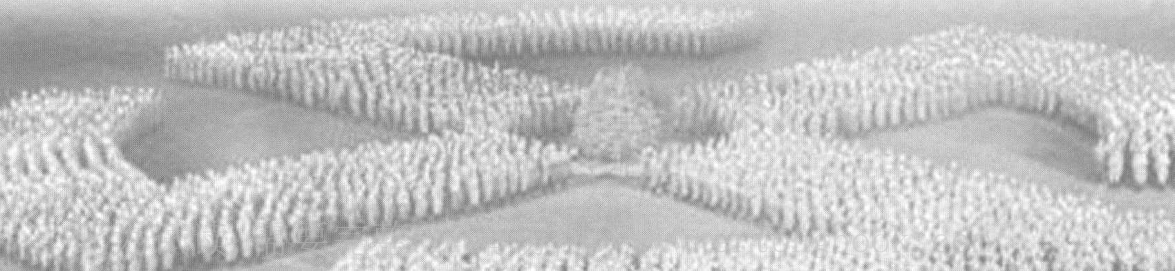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篇 希特勒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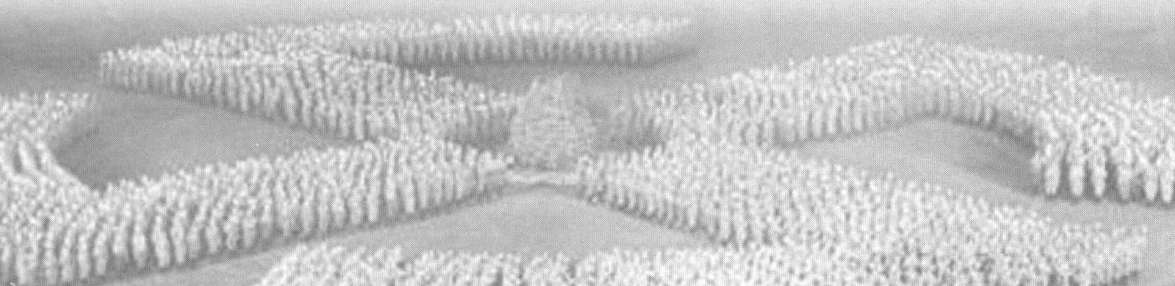
一、希特勒五章	2
1. 早年：权威人格与斗争哲学	3
2. 崛起：魏玛民主政制及其瘫痪	12
3. 壮岁：军事家？艺术家？	25
4. 自杀：失败抑或成功	43
5. 遗产：理想主义还是虚无主义	54
二、希特勒的选择	67
1. 政治取向：左右之外	67
2. 军事战略：从闪击战到总体战	83
3. 冷战预言：西方对东方	95
三、希特勒身边的大人物	112
1. 沙赫特利用希特勒？	113
2. 爱动物与反人类的戈林	119
3. 希特勒后面的鲍曼	129
4. 施佩尔的暧昧	134
5. 把一切献给希特勒的戈培尔	144
四、希特勒身边的小人物	157
1. 他们知道他	158
2. 他们不知道他	166
3. 他们被他催眠了	179



五、希特勒的群众	192
1. 革命后的两种人	193
2. 有动机与无动机	202
3. 乡村警察的制服与灵魂	211
六、希特勒的新人	220
1. 重新造人	220
2. 成功的典型	232
3. 不成功的原因	242
七、希特勒无所不在	252
1. 在语言运用中	253
2. 在新问候礼中	262
3. 在日常笑话中	271
4. 在柏林生活中	278
八、希特勒与陆军的斗争	285
1. 合作与冲突的变奏	285
2. 陆军失败	296
3. 上校登场	309
4. 职责之上的良知	319
九、希特勒该不该杀？	327
1. 隆美尔：没必要杀	328
2. 古德里安：不应该杀	337
3. 邓尼茨：当杀而不该杀	349
十、反希特勒的三种间谍	359
1. 左尔格的悲情：不合上意	360
2. 克里斯蒂娜的悲凉：不堪平庸	370
3. 科尔贝的悲愤：不被理解	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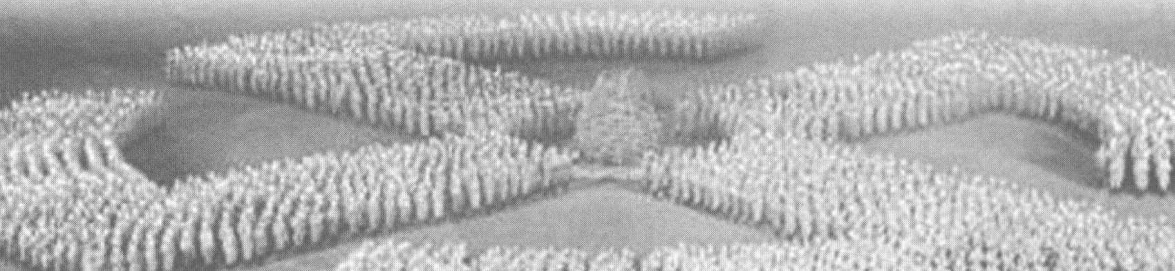


十一、昨天与今天：施特劳斯的悲剧	392
1. 投机、顺从还是无奈	393
2. 昨天、今天与自由的丧失	399
3. 自觉逃避与不自觉的介入	406
十二、指挥贝多芬的权利：富特文格勒的分辨	413
1. “艺术只有好坏之分”	414
2. “我不后悔留下来”	420
3. “音乐属于另外一个世界”	426
十三、里芬施塔尔电影的“纳粹性”	432
1. 相互利用	432
2. 并不客观	440
3. 美化权力	448
十四、1941 年秋夜的海森伯	458
1. 说不清的当年事	459
2. “测不准”的戏剧化	466
3. 分不开的物理学与政治	477
十五、海德格尔的错误与他的学生	486
1. 老师抱负本无限	487
2. 学生的为难	497
3. 要不要“说清楚”？	506
十六、阿伦特的爱与思	516
1. 不平等的爱	517
2. 阴影下的爱	524
3. 反政治的爱	5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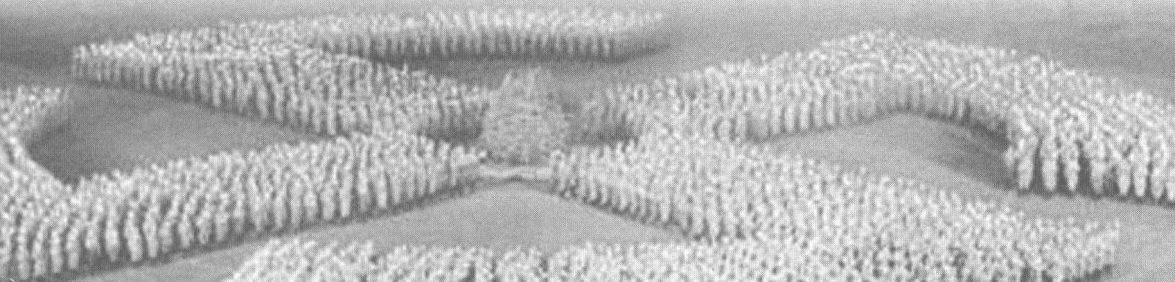


十七、大屠杀是一种文化	546
1. 反犹文化的后果	547
2. 文化分析的不足	554
3. 纳粹反犹的新义	562
十八、大屠杀是现代事件	572
1. 作为必要条件的现代性	572
2. 技术/组织的理性化	583
3. 行为的非人格化	595
4. 理性之外的德国性	604
十九、大屠杀是原始行为	614
1. 东部犹太人	615
2. 一个村庄的嗜杀	624
3. 党卫军的文明?	633

二十、为什么是奥斯维辛	650
1. 集中营、灭绝营与奥斯维辛	651
2. “死亡工厂”的关键词	663
3. “杀人机器”的结构与流程	675
二十一、罪犯的抱负：种族与乌托邦	685
1. 希姆莱的迷狂	686
2. 海德里希的工艺	697
3. 门格尔的实验	714
二十二、囚犯的信念：只要活下去	726
1. 不信上帝	727
2. “我不绝望”	735
3. 苟且偷生	742



4. 因为爱情	751
5. 全是偶然	758
二十三、囚犯经验的多样性	767
1. 达豪之歌	767
2. 华沙谎言	775
3. 米斯堡的生活小品	784
4. 地窖里的上帝之光	793
5. 悲歌同性恋	801
二十四、囚犯艺术的多歧性	812
1. 涵养人性	813
2. 记录真相	819
3. 粉饰暴行	826
4. 配合恐怖	832
二十五、恶时代的善	840
1. 辛德勒不只是善人	840
2. “施梅尔特组织”的及犹太人领袖的双重性	851
3. 与凶手做交易?	862
二十六、党卫军本性难移	874
1. 继续随大流	874
2. 还是听朗读	884
3. 由暴力而金钱	893
4. 由纳粹而后现代	900
二十七、幸存者依然不幸	911
1. 集中营没有过去	912
2. “我不要活下去”	919
3. “我不要孩子”	926



二十八、文学奥斯维辛	935
1. 把人“集中营化”的奥斯维辛	935
2. 把奥斯维辛“正常化”的小说	945
3. 记忆如何可能	958
4. 在孩子的眼中	967
二十九、政治化的代沟	978
1. 女儿质疑：狼可以在一代 之间驯化为羊吗？	979
2. 母亲无悔：我还是原来的我	987
3. 父亲理智：你应当走出去	996
三十、新生三部曲	1004
1. 40年代：孤独的自我反省	1004
2. 50年代：同时代人的馈赠	1016
3. 60年代：告别纳粹与后纳粹文化	1025
三十一、“奥斯维辛之后”的诗	1035
1. 阿多诺的判断	1035
2. 策兰的探索	1046
3. 策兰、阿多诺与海德格尔的语言及政治	1057
三十二、“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化理论	1070
1. 启蒙倒退为野蛮	1071
2. 文明与暴政共生	1087
3. 意义的文化建构	1103
推荐书目	1115
后记：从五十周年到七十周年	1118





第四篇

溯源大屠杀

十七、大屠杀是一种文化

我们的后代不必再进行这些屠杀。

——海德里希 1942 年视察奥斯维辛时的谈话^①

纳粹暴政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大屠杀。纳粹大屠杀的对象并不限于犹太人，还有吉卜赛人、波兰人、斯拉夫人等等，还有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苏联红军政治委员等等。但最集中的群体显然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具体死亡数字很难精确。纽伦堡法庭估计为 585 万，包括战前波兰的 300 万，苏联的 200 万，以及其他国家的 100 万。对犹太人的屠杀由来已久，一部欧洲史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排犹史，但只有在纳粹体制下，对犹太人的屠杀才成为种族灭绝。这一行为似乎具有偶然性，比如有学者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在通往‘最终解决方案’的道路上，希特勒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和不可缺少的。如果他没有在 1933 年上台，也可能会出现一个保守党政府，或另一个军事独裁政府，歧视犹太人的法律很有可能也还会在德国出现。但没有希特勒和以他为首的独一无二的纳粹政权，制订并实施一个从肉体上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是不可想象的。”^② 但更多的研究都关注纳粹大屠杀与传统反犹主义的关联。研究大屠杀的权威史家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不但把希特勒的战争称之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而且认为大屠杀是欧洲排犹思想的极端体现。在有关大屠杀的研究中，这几乎是主流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分析。

① 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2002），朱刘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6 页。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具体实施者，海德里希的邪恶意愿是彻底灭绝犹太民族。

② 伊恩·克肖：《希特勒》（1998）（下卷），赖兴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80 页。

1. 反犹文化的后果

20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各类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一些大学甚至设置了大屠杀（holocaust）专题课。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据其博士论文写成的《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于 1996 年出版后，不但风行美国，跻身十大畅销书，被英美学界认为是“称得上里程碑的畅销不衰的著作”，而且德国的《时代》和《明镜》等著名媒体也很快推介此书，德语版销量达十多万册，成为当时销量最大的畅销书，并引发了“历史学家争论”。次年，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维帕曼（Wolfgang Ipermann）还专门推出分析戈德哈根论争的综述性著作《谁之罪》（*Wessen Schuld*, Berlin: Elefant Press, 1997）。戈德哈根的主题是“普通的德国人是如何陷入种族的排犹主义而变成心甘情愿的大屠杀刽子手的”。他紧紧抓住大屠杀执行者的“志愿”特征来反思纳粹大屠杀，确认反犹主义是德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纳粹反犹主义是普通德国人信仰的主要部分。当纳粹实施大屠杀政策时，普通德国人充当了心甘情愿的刽子手。这就是说，大屠杀不是一种偶然的集体犯罪，而是一种国家计划、一种文化的结果。

戈德哈根的文化解释有三个层次——

首先，作者认为灭绝种族的意识形态是德国对犹太人的认识模式。早在纳粹掌权以前，“德国流行的政治思想的基本概念是 Volk（人民），它把犹太人作为它的对立面。‘人民’的概念中贬低了犹太人，后者体现的是负面品质。德国政治存在的观念基础和道德基础包括了犹太人的恶劣品质。这使排犹主义的文化观念模式具有了更大的持久力和政治威力”^①。在德国社会生活中，“人民”不包括那些长期定居在德国、在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犹太人。在德国“人民”看来，犹太人是恶毒的、邪恶的、异己的，是颠覆分子、破坏分子。德国的民间传说、学术论著、报章杂志、政治性的小册子等等，都刻画了关于犹太人的恶毒形象，“这构成德国文化的核心部分”。以至于 1921 年，爱因斯坦在目睹了

^①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1996），贾宗宜译，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 页。

德国犹太人的悲惨境遇之后，便断言自己“将在十年内被迫离开德国”。1920年纳粹发布25条政纲，此后一直没有修改；同年希特勒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气势汹汹地说：“……我们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彻底铲除犹太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即使同魔鬼携手合作，也在所不惜。”他甚至说，“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和战争期间，把腐化人民的12000名或15000名犹太人放到毒气室杀死的话”，几百万“真正的德国人”就可以免于一死。^①纳粹党的党纲和希特勒的言论都是公开的，但德国人民仍然在1933年把希特勒选为总理。所以无论德国人民对纳粹有什么看法，也无论他们多么憎恨纳粹主义的某些方面，但纳粹的排犹主义却是德国社会的共识。反犹主义的主力是冲锋队，其队员多达200万人，约占德国成年男子的10%；而且无数的非党员、非冲锋队员在羞辱、欺侮、殴打犹太人时也并不犹豫，甚至教会领袖也支持对犹太人的屠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纳粹化’了。”^②纳粹的所为，只是把有计划的犹太人迫害行动变成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其次，排犹主义是纳粹持之以恒的目标，并得到德国人的认同。尽可能彻底地、最终地消灭犹太人的力量 and 影响是纳粹的基本政策，在其执政之后，虽然有1936、1937两年的相对平静，但从一开始，纳粹就有计划地把犹太人从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排除出去。1933年4月1日对犹太人商店的抵制；通过《恢复职业公务员法》把种族作为雇佣公务员的条件；1935年9月的纽伦堡法律及随后的立法区分“人民”与犹太人；最严重的1938年11月9日砸毁了约7500家犹太商店的玻璃橱窗，很多犹太人被押进集中营。通过口头和文字的攻击、肉体的袭击、法律和行政上的种种限制、建立犹太人聚居区以及迫使他们流亡等办法，到1939年，德国已成功地使犹太人“在社会上死亡”。1939年进攻波兰之后，纳粹进一步加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占领区强迫建立犹太人聚居区，规定犹太人在公开场合佩戴黄色的“大卫之星”标志，并开始屠杀一些犹太人。1941年底，盖世太保领导人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受命提纳粹出在欧洲范围内“最终解决犹太人方案”。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之后，在波

①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11、25页。

②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13页。

兰建立了若干“死亡集中营”，最著名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通过大规模的枪杀，特别是毒气室的集体屠杀等手段，数百万犹太人死于非命。从希特勒到中低级的官员，所有参与种族大屠杀的人都公开地为他们的行动而自豪。20世纪30年代，在得到人民普遍支持的情况下，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宣布并执行了大屠杀。大屠杀不是希特勒的心血来潮，而是他一心想消灭犹太人的全部力量这一“理想”的产物，而这一“理想”在德国得到广泛的认同。行刑者不是出于服从命令、环境压力或者为个人利益着想，而是主体自觉自愿的行为。

最后，也就是该书的核心观点，大屠杀的行刑者是自愿的凶手，他们都是普通的德国人，不是受过意识形态灌输、受着组织约束的纳粹恶魔。毒气室和焚尸炉，希特勒、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海德里希和艾希曼（Karl Adolf Eichmann）固是杀人魔王，但还有更多的机构和人员参与了大屠杀，这些人加上军队的共谋者，计有几百万之众。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纳粹建立的一万多个集中营中，大量普通德国人为集中营体系提供了人力资源，他们同纳粹党、党卫军等纳粹机构并无特殊的联系。他们同党卫军和纳粹党中的其他普通德国人一起，折磨着、屠杀着集中营的犯人。在这些普通德国人中，戈德哈根选择了第101刑警营（Orpo）作为分析的对象。特遣队最初有500名刑警，进攻苏联后增加到550名，其中大部分是年龄较大、不能再进入武装部队的男性。戈德哈根之所以选择刑警营，一方面是因为刑警营直接参加了大屠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刑警营的德国人有相当大一部分并非出于他们在军事或意识形态上的合格，而是被偶然选中的。他们在军事技术、思想灌输甚至武器、后勤和程序方面的训练是微乎其微的；他们不是纳粹机构，其人员并没有纳粹化，有些人被认为是不适于服兵役的，有的人是为了逃避兵役才当警察的。他们只接受了两个月的特殊培训，就被派到苏联，居然很快就适应了凶残的杀人者角色。在详细评论了刑警营配合党卫军的特遣队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之后，作者根据1945年后一次德国起诉调查所获得的完整记录，以第101刑警营为中心，集中分析这些由普通德国人组成的行刑者的志愿特征。

如何分析这些行刑者的文化心理呢？

从其人员构成上说，他们来自德国社会的各个等级、各种行业。他们像水珠一样存在于德国的大街小巷中。他们是商人、学生、老师、工人，

甚至还有在公司当过秘书的美丽少女。在其 550 名成员中，只有 179 人是纳粹党党员、21 名党卫队队员，纳粹化程度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预备役人员，他们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军事机构或安全机构，实际上并不具有军人素质。“在纳粹统治德国期间，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观点通常使德国人彼此有差异，但在屠杀犹太人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彼此没有什么不同。”^① 第 101 刑警营的成员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也不是职业军人，更不是杀人狂，而只是普通德国人，他们广泛地代表了德国社会。

从其行为方式上看，他们绝不是被迫完成任务的违心的杀人者。根据有关证词，希姆莱曾下命令，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成员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1942 年 6 月，第 101 刑警营被第三次派往波兰实施大屠杀，当他们明白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时，没有人表示出不理解和惊讶，没有人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营长特拉普是正直之人，在他的领导下，执行屠杀犹太人的任务是自愿的，并没有强迫成分。布赫曼中尉不去杀犹太人，因为他没有被强迫去杀人；其他人去杀，是因为他们自愿这样做。当特拉普询问是否有人不愿意干这件事，结果只有十来个人表示不适宜去完成这个任务，那些不愿意屠杀的人安排了另外工作。没有一人因此而被处决或监禁，所以每次组织行刑队，总是有足够多的志愿人员，第一连连长还把这次行动称为“非常有趣的任务”。1942 年 7 月 13 日拂晓，该营在乔泽福夫（Jozefow）附近处决了大约 1500 人，平均每人杀死 5—10 个犹太人，其中多为老人、妇女和小孩，他们非常“认真”地完成了任务。屠杀本身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面对着犹太人的喊叫、女人的哭声、儿童的抽泣，德国人必须有一颗冷酷的心才行。由于距离太近，受害者的鲜血往往溅在德国人身上。尽管如此可怕、令人不安，但是，这些德国人依旧回去再搜索一批犹太人，在林中找块新地方处决他们。有一个刽子手生动地回忆说：

根据斯泰因麦茨军士的指示，这些犹太人被带进了森林里。
我们跟着他们。走了 220 码以后，斯泰因麦茨命令说，这些犹太

^①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 109 页。

人必须并排地躺在地上。我要指出的是，当时只有妇女和儿童。那些孩子们大约 12 岁。我要枪杀的是一个 60 多岁的老太太。那位老妇人对我说，让她死个痛快吧。……我旁边是科赫刑警。……他的对象是一个 12 岁左右的孩子。上级明确指示我们，枪口同后脑勺的距离是 8 英寸。科赫显然没有这么办。因为离开行刑现场的时候，其他战友都笑我，孩子的脑袋的碎骨和碎肉溅到我的手臂上，粘在那里。我问他们为什么笑，科赫指着我身上的血肉说，“那是我那个孩子的”。他露出得意洋洋的样子。^①

参加这次屠杀的一个警察事后回忆：“我没有看见过我的任何一位战友表示不愿意参加。”在洛马齐，他们屠杀了 1700 名犹太人。除这些集中屠杀外，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只要发现有犹太人，他们也不放过。经常性的小规模屠杀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有人回忆：“今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们刚走到地堡跟前，一个 5 岁的犹太男孩子爬出来。刑警立即抓住他，把他带到一旁，用手枪对准他的脖子，打死了他。这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警察，他在那里当卫生员。”积极主动之外，还有杀人取乐的：“在贝克迈尔的指挥下，我们把一批犹太人运往某地。他让这些犹太人钻水沟，一面钻，一面唱歌。当一个老人再也爬不动时，他朝老人的嘴开了一枪。”^②行刑者不只是完成任务，而是经常富有“创造性”地杀人，有时没有上级的命令也积极主动地杀人，即使是血肉横飞、脑浆溅满行刑者的衣服、受刑者极端痛苦的号叫等如此可怖的情形也没有使他们却步。在此过程中，他们还恣意蹂躏犹太人，从对他们的侮辱和虐待中取乐。行刑者从来没有考虑过把屠杀的真相隐匿起来，不但经常相互之间经常兴奋地交流杀人的经验，也喜欢让他们的妻子、女友、子女了解、观看他们的灭绝种族行为。连长沃劳夫新婚的妻子就在营房里度过其蜜月，她多次目睹屠杀行动，还亲自参加了一次大屠杀。当行刑者污辱或戏弄犹太人时，围观的德国人往往以此为乐，这说明这些旁观者也是支持这一行为的。行刑者不但清楚，而且宣传自己的杀人业绩。“德国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包括

①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 64 页。

②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 74、75 页。

屠杀场面）拍了大量照片，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是十分满意的。”^①。

从其屠杀对象来说，他们的行为有选择性，即优先杀害犹太人。戈德哈根发现，德国人热衷于消灭犹太人，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宁可推迟对付给他们造成真正威胁的游击队，也要先去捕杀犹太人。1942年9月25日，一名德国军士被波兰人打死，上级要特拉普营长报复性地杀死200名波兰人，但他只在集中起来的300人中挑选了78名加以杀害，而且行动之后，这位营长十分忧郁，甚至哭了。作为进一步报复的措施，他们走了5英里到另一个村杀害了180名犹太人。“特拉普在过去的两个半月里领导他的人马参与杀害了大约2万名犹太人，毫不心软；却为杀掉不到100名波兰人而流泪。他的一些官兵也希望以后不要再屠杀波兰平民。当第101刑警营杀害那78名波兰人时，特拉普派他的人去安慰暂时软禁在学校里的这些被枪杀的波兰人的妻子。”^② 屠杀波兰人虽有必要，但行刑者感到遗憾，而在屠杀犹太人时，他们却没有任何顾虑。

从其行刑环境来说，他们是在德国社会、文化空间中行刑的。行刑的地点虽然不在德国，但“事实上，德国在波兰精心塑造的文化生活成为刑警营生存的天地，刑警营的官兵们在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以后，又回到比较正常的德国文化生活中。他们的文化活动包括：警察俱乐部、娱乐中心、酒吧、运动场、剧院、影院、教堂、谈情说爱的地方、讨论伦理道德之所”^③。第101刑警营有自己的保龄球馆。第25刑警团在1942年10月18日举行秋季田径运动会、11月3日和4日观看警察系统的柏林青年剧团的演出，这个团长有时批评其部下的浪费行为——大量包装材料、矿泉水瓶和其他的瓶子乱扔乱放，有时批评其部下在观看演出时“高声喧哗”、“扰乱秩序”，强调要“遵守公德”。这些行刑者还在屠杀的同时谈情说爱，大屠杀的阴影并没有妨碍他们正常的文化生活，这类娱乐活动的通知有时是与屠杀犹太人的任务一起放在同一个通告中下达的。与行刑者们生活在德国文化环境中相对，他们的残忍行为也往往具有毁灭一种文化的性质：他们侮辱和折磨犹太人，割掉犹太人的络腮胡子，选择长胡子的犹太人毒

①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82页。

②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79页。

③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97—98页。